

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

司马光及其 《资治通鉴》

王锦贵 著
张希清 审定



中國歷史博物館
藏書

大象出版社

04.3

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
司马光及其《资治通鉴》

王锦贵 著
张希清 审定
责任编辑 刘 健

大象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农业路73号 邮码450002)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875印张 95千字

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325册

ISBN 7-5347-2013-3/Z·70

定 价 5.90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98
K204.3
49
2

总 序

袁行霈 吴同瑞

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,光辉灿烂,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。今天,当历史车轮进到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交替的年代,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。实现这一宏伟目标,既有重重困难,也有种种有利条件。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,对广大人民、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and 传统美德教育,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。毫无疑问,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,宏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,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,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,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,具有积极意义。有鉴于此,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,共同推出“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”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宏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,学校领导于 1992 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。中心成立后,依托中文、历史、哲学、考古等系,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。一方面,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,编辑出版《~~国学研究丛刊~~》和《国学研究丛刊》;另一方面,注重于文化

• 1 •

31890

普及工作，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”。与有关单位合作制作的电视系列片《中华文化讲座》和《中华文明之光》，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。编写这套丛书是中心普及工作的又一尝试。中心希望丛书的作者们“眼界向上，眼光向下”，用大手笔写通俗性著作，学术性、知识性、可读性并重，力求深入浅出，使广大读者增长知识，陶冶情操。

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，有精华也有糟粕，不加以区分不行；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，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曾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交流、碰撞与融合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没有纵览古今、通观世界的眼光不行。我们抱着历史的态度、分析的态度、前瞻的态度、开放的态度，从事发掘与研究的工作。这种态度也力求贯彻到本丛书中。然而，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我们的选题只能侧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、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；对那些目前尚未充分注意的学科如法律思想史等，也适当予以注意。

从选题和内容来看，这套丛书可分为文学、语言、历史、哲学、考古、法律、科技、中外文化交流等若干系列，每个系列都由研究中心聘请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担任主编，每部书稿都经同行专家审阅。因此，中心不再对丛书作统一的审定工作。

大象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们非常重视这套丛书，把它列为重点出版书目，并为丛书的及时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本丛书的策划、编写工作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，敬希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一	极不平常的一生	2
	(一)世家·学问·仕途	2
	(二)“清白”·“朴忠”·直谏	6
	(三)熙宁风波与洛阳著书	11
	(四)元祐之举与身后褒贬	16
二	《通鉴》的问世	20
	(一)历史背景	20
	(二)著述始末	29
三	旨在“资治”的政事史	37
	(一)分外重视政治领域	38
	(二)朴素唯物的自然观	54
	(三)“臣光曰”的良苦用心	62
四	巨著成就及特点	76
	(一)珍贵的历史资料	76
	(二)优良的编撰方法	84
	(三)求“通”传统的进一步弘扬	101
	(四)美中不足的缺憾	104
五	方兴未艾的“《通鉴》学”	108

(一)续修	109
(二)节选	115
(三)注释	116
(四)评论	123
(五)改编	129
余论	142
附录：“《通鉴》学”著作简表	145
一、“续修”书目表	145
二、“节选”书目表	146
三、“注释”书目表	147
四、“评论”书目表	148
五、“改编”Ⅰ——纪事本末书目表	148
“改编”Ⅱ——纲目体书目表	150

宋哲宗绍圣初年，一场激烈的论争在朝廷展开：大臣薛昂、林自等人迎合当时政治形势，坚持毁掉一部业已刻版的书籍。对于这种毁书的行径，太学博士陈瓘怒火中烧。他挺身而出，力排众议，最后以该书前面有宋神宗的“御序”作武器，转守为攻，巧妙地使拟毁之书保存下来。

陈瓘的这一举措，实在是为后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因为幸免于难的这部书不是一部普通的书，它便是中国古代史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，几百年来一直放射着耀眼光辉的编年体通史巨著——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这部书后来产生的巨大影响，或许不单是当时的发难者没有想到，即便是陈瓘本人，也是始料不及的。

一 极不平常的一生

司马光是继司马迁之后,在中国古代史苑上空升起的又一颗罕见的巨星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。两巨著春兰秋菊,雄视千古;“两司马”双峰并峙,流誉天下。正如学习《史记》有必要了解司马迁那充满坎坷的生平一样,研究《资治通鉴》也必须知道司马光那极不平常的人生经历。

(一) 世家·学问·仕途

司马光(公元1019~1086年),字君实,陕州夏县(今属山西)人。据其父司马池声称,司马氏乃是晋朝安平献王司马

孚的后人。由于当年的征东大将军司马阳死后葬于安邑，而北魏时将安邑划分，设置了夏县，从此，司马氏一系也就成了夏县人。正史中有关司马氏世系的详情虽然没有系统的反映，但是，至少在司马光祖父那一代，司马氏仍系名门望族当属无疑。因为在《宋史》中明白记载，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“少丧父”，当时尚有“家赀数十万”。父亲司马池，字和中，勤奋读书，进士出身。他出任过光山县令、利州路转运使，累迁侍御史知杂事，擢天章阁待制，知河中府，徙知同州、杭州等。司马池生有二子：长子名旦，次子曰光。司马光的兄长司马旦，字伯康，历任郑县主簿，知安州等，凡十七迁，官至太中大夫。

这样的家庭环境，对早年的司马光自然有重要影响。

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(公元1019年)，自幼聪明过人。小时候，他曾与一群儿童在庭院中游戏玩耍。有一小孩脚登水缸，不慎跌落水中。其他孩子见状，吓得抱头逃窜，唯有司马光不慌不忙。他拿起一块石头，朝水缸猛烈砸去，把水缸打破了一个洞，里面的水立刻哗哗外流，小儿得救了。后来，京城开封和洛阳地区将此事绘为图画，在民间广泛地传扬开来。

司马光的聪明智慧与他的勤奋好学有直接关系。还在七岁的时候，他就“凛然如成人”。有一次，他听了父兄们讲述《左氏春秋》，感到异常兴奋，事后居然能向家人转述，并讲解其中主要内容。从此，司马光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小小年纪，便手不释卷，有时沉浸于书海，甚至达到了“不知饥渴寒暑”的程度。司马光对史学的爱好不惟小时如

此,而且终生未变。在后来写给皇帝的《进书表》中,他曾经非常谦虚地介绍自己,生平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别人,只有对史学方面的研究“粗尝尽心”,并且是“自幼至老,嗜之不厌”。司马光以为,阅读历史典籍,一定要持之以恒,即所谓“君子好学不厌,自强不息”。只有这样,方能“推之使远,廓之使大,耸之使高,研之使深”(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卷六十八)。司马光热衷于史学,不单历来注重要熟读文献原文,而且还特别强调要弄懂书中蕴含的道理。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学习心得:“书不可不成诵,或在马上,或中夜不寝,时咏其文,思其义,所得多矣。”(朱熹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)

由于司马光不知疲倦地刻苦攻读,因而学术淹贯,自经史百家以至天文、律历、音乐、术数,无所不通。同时,还才华横溢,擅长于著述,能够写出一手直追西汉风格的好文章。宋仁宗宝元元年(公元1038年),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便春风得意,一举考中进士。在初任奉礼郎时,考虑到父亲司马池正在杭州就职,为了省亲之便,他请求改为苏州签书判官。然而,没有多久,双亲相继去世。服丧期满后,曾出任签书武成军判官,旋改大理评事,补国子直讲。此后由于枢密副使庞籍的举荐,又出任馆阁校勘、并州通判。嘉祐二年(公元1057年),改直秘阁、开封府推官。嘉祐六年迁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,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。英宗时,进龙图阁直学士。神宗即位,擢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、权御史中丞。因反对王安石变法,出知永兴军。熙宁四年(公元1071年),判西京御史台,自此退居洛阳十五年,专心著述。元丰八年(公

元 1085 年), 哲宗即位, 召为门下侍郎。元祐元年(公元 1086 年)春, 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(即宰相), 同年九月, 因病去世, 享年六十八岁。司马光一生勤奋, 著作等身, 今日可见的作品除了举世瞩目的《资治通鉴》外, 主要的还有《易说》、《稽古录》、《涑水记闻》、《法言集注》、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》(简称《传家集》)以及《通鉴目录》、《通鉴考异》等等。

司马光的名字除本名外, 还有其他一些称谓。例如, 因为他是夏县涑水人, 后人遂称其为“涑水先生”。他的笔记体著作《涑水记闻》也是因地取名的。此外, 司马光还有“司马温公”、“司马文正”的称号。其中, “温公”是他的封爵, “文正”则是他的谥号。

司马光生有一子司马康, 亦属史上有名。康, 字公休, 自幼端庄谨慎, 不苟言笑。敏学过人, 博通群书, 以明经擢上第。元丰元年(公元 1078 年), 司马光在其得力的《通鉴》助手刘恕去世后, 上奏朝廷, 授予司马康检阅《资治通鉴》文字。从此, 司马康长年追随父亲, 一起参加修书工作。康“事父母至孝”。母亲去世时, 他“勺饮不入口三日”, 痛不欲生。父亲病逝后, 他“居庐疏食, 寝于地, 遂得腹疾, 至是不能朝谒”。年四十一而卒。司马康历任校书郎、著作佐郎兼侍讲、右正言, 死后, 诏赠右谏议大夫。

(二) “清白”·“朴忠”·直谏

司马光在居住洛阳时，曾写过一首《书怀》诗，其中有“所存旧业唯清白，不负明君有朴忠”一句。这里所说的“清白”、“朴忠”，固然是作者本人的表白，而观其一生行止，又有谁能否认这不是司马光入仕以来，特别是他担任谏官以来，兢兢业业，忠于职守的鲜明写照呢？从维护朝廷的根本利益出发，小自后宫封赠、外国贡品、日月之食，大至官员任免、边防治要乃至帝王继统，司马光历来指陈是非，直言敢谏，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。这一点，大概就连司马光的政敌们也无法否认。

朝官麦允言病故，仁宗想给予卤簿^①，司马光不同意这种做法，于是向朝廷进言道：“以繁纓^②给朝官，就连当年的孔老夫子也不曾有过。麦允言不过是亲近的幸臣，并没有开国元勋们的丰功伟绩，却赠予他三公官那样的待遇，给他一品卤簿，还有那赠送的繁纓，岂不是太过分了吗？”

充媛董氏病死后，仁宗要赠以淑妃的名位，还将停朝成

① 卤簿：古代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。出行的目的不同，仪式亦各有区别。自汉以后亦用于后妃、太子、王公大臣。唐制四品以上皆给卤簿。宋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：“唐人谓卤，櫓也，甲楯之别名，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，捍蔽其先后，皆著之簿籍，故曰‘卤簿’。”

② 繁纓：古代天子、诸侯所用辂马的带饰。繁，马腹带；纓，马项革。

服^①，文武百官都要前往吊祭，并要确定谥号，行册封之礼，甚至要在葬礼上给予卤簿。司马光认为，这样的举动远远超出了规矩，所以，毅然上疏进谏：“董氏的品级原本是低微的，仅仅是病重以后才拜为充媛^②。再说，古代的妇女并没有什么谥号，近世以来，也只有皇后才有谥号。至于卤簿，那本是用以奖励军功的，从来也不曾给予妇人。诚然，当年唐代的平阳公主曾有过谥号，但那是因为她曾经起兵帮助高祖平定天下的缘故。”因而，司马光坚决抵制了这种越轨的行为。

宋神宗时，百官欲上尊号。这对皇帝来说，自然是既荣耀又惬意的事。司马光却不愿随声附和，他力排众议，直陈个人见解：“以前先帝亲自举行郊祀大典时，也不曾受过尊号。后来有人提议，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，对方有尊号而我方却没有，这才由于特殊情况而有了权宜之举。古时候，匈奴冒顿^③曾经自称为‘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’，却并不曾听说过汉文帝增加过什么名号。但愿遵从先帝本来意愿，不要接受这种名号。”神宗听后，觉得很有道理，还特意写下诏书表扬了他。

帝王继统是直接关系封建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，自古

① 成服：旧时指丧礼大殓之后，亲属依照与死者的亲疏关系穿上不同的丧服。

② 充媛：又称充给，后宫名称之一。据《后汉书·皇后纪序》：“又置美人、宫人、采女三等，并无爵秩，岁时赏赐充给而已。”

③ 冒顿 mò dú：汉朝初年匈奴族的君主名。

以来，虽大臣不敢妄言。宋仁宗病情严重，却迟迟没有册立太子。为此，朝野有识之士感到“寒心”，却又不敢表示意见。谏官范镇首先提出个人建议。当时远在并州供职的司马光得悉这一消息后，不单立即写信鼓励范镇一定要死力相争，而且自己也有奏章，还特意当面谏诤。司马光建议皇上“选宗室为继嗣”，务必“果断力行”。时过不久，再次上疏仁宗，言辞更为恳切。他说：往日所奏，原以为会有行动，然而至今寂无所闻，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，不必虑及“不祥之事”云云。这帮小人之所以如此，无非是想在仓促之际，援立他们所“厚善者”罢了。所谓“定策国老”、“门生天子”之祸，难道以往出现的还少吗？仁宗听此一席话，大受感动，立即命令送中书商议。经过司马光、韩琦等人的筹划、奔波，终于将后来的英宗册立为皇太子。

宋英宗时，朝廷曾下令陕西集结义勇二十万人，致使百姓惊慌，社会秩序混乱。司马光根本反对这一举措，所以质问主事大臣韩琦。韩琦回答说：“军事上都注重先造舆论，现今外敌桀骜不驯，让他们突然听到增兵二十万的消息，这难道没有威慑作用吗？”司马光反驳说：“所谓军事上注重制造舆论，乃是有名无实，况且仅可以欺骗对方一时罢了。如今我们增加了兵力，实际上又不能使用，不过十日，对方必定能了解清楚，到那时人家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？”韩琦又以先前乡兵可以“永不充军戍边”为由，以示现今政策可行。司马光则针锋相对地指出，由于朝廷曾经失信于民，民“未敢以为然”，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大臣也不能不产生怀疑。韩琦被驳得理屈词穷，但没有采纳司马光的观点。仅仅过了几年

时间,司马光原先忧虑的事情出现了。

官员选拔的得当与否,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建设的大问题。每当论及具体人事,司马光对那些不堪重任的官员毫不留情,总是严厉揭露其短,竭力阻拦其升迁。英宗时,曹佺^①没有什么功劳,却晋升为使相^②,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都予迁官,司马光对此颇为不满。他为此上奏皇帝说:“陛下想要安慰母后之心,因而升迁官职不按规矩,这样一来,宿卫将帅、内侍小臣,一定会滋生非分之想。”没过多久,朝廷又将宦官入内都知^③任守忠的职务升迁,司马光再次直谏:“任守忠是名副其实的奸臣,陛下立为太子,并非出于守忠本意。正是他破坏国策,离间百端,幸亏先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;陛下嗣位后,他反复进行调唆,实在是国之大贼。乞斩于都市,以谢天下。”皇上以为司马光所讲颇有道理,遂将任守忠贬为保信军节度副使,蕲州安置,天下闻之,人心大快。

在任职谏官的日子里,为了赵宋皇朝的长治久安,司马光忠心耿耿,还先后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治国谋略。例如,他曾经向仁宗进献所谓“保业”、“惜时”、“远谋”、“重微”、“务实”的“五规”学说,强调“此皆守邦之要道,当世之切务”(《传家集》卷二十一《进五规状》)等等。但是,比较起来,尤

① 曹佺:宋朝皇亲,字公伯,韩王曹彬之孙,宋仁宗光献皇后之弟。

② 使相:唐代中期凡为宰相者必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故称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衔的节度使为使相。宋初因之,以亲王、留守、节度使加侍中、中书令、同平章事者皆谓之使相,不主政事。

③ 都知:五代、宋朝时殿前武官名,属殿前司。

为引人注目并最能代表司马光深刻见地的，要数他论述君德的《三德》论和论述用人之道的《御臣》论了。

《三德》论，讲的是人君之德。在司马光看来，但凡英明有为之君，都应当具备三方面的品德，这就是：仁、明、武。什么是“仁”呢？“仁”不是生养抚育、迁就容忍的代名词，而是要“兴教化”，“修政治”，“养百姓”，“利万物”，这才是“人君之仁”。什么是“明”呢？“明”并不是繁杂苛细的观察，而是要“知道谊^①”，“识安危”，“别贤愚”，“辨是非”，这才是“人君之明”。什么是“武”呢？“武”决不是强横残暴之义，而是只要道义所在，便可“断之不疑，奸不能惑，佞不能移”，这才是“人君之武”。人君具备“三德”，国家必然富强。缺一则衰弱，缺二则危险，三者无一就一定会灭亡（《传家集》卷二十《陈三德上殿札子》）。

《御臣》论，讲的是朝廷用人之道。司马光以为，所谓“致治之道”没有其他内容，无非三条而已：一是任官，二是信赏，三是必罚。这三条的具体内容是，在用人方面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：即依材授任，量能授职。有功则晋级奖赏，不要迁徙其官；无功则降黜废弃，而另选贤能任之；有罪则施以“流窜刑诛，而勿加宽贷”。长此以往，则朝廷必尊，万事必治，百姓必安，四夷必服（《传家集》卷二十《言御臣上殿札子》）。

因为《三德》论和《御臣》论属于治国要道，是司马光的重要政治主张，所以尽管这一理论最初是在仁宗朝提出来

① 道谊：即道义。

的,后来他对英宗、神宗也多次论及。司马光甚至深有感触地对神宗说过:“臣获事三朝^①,皆以此六言^②献,平生力学所得,尽在是矣”(《宋史》本传)。情深意切,尽职尽责,司马光对朝廷的一片赤诚,于此可窥一斑。

据文献记载,司马光“于学无所不通”,然一生追求朴素自然。在物质方面,他“淡然无所好”;在意识形态领域,他从来不喜欢佛、道两家的信仰和学说。他曾对别人说过:“其微言不能出吾书,其诞吾不信也”(《宋史》本传)。在洛阳居住期间,他仅有田三顷,妻子病故后,出卖田地料理丧事。一生简朴无华,不单鄙薄衣饰奢靡,也讨厌山珍海味。如此等等,或许就是司马光《书怀》诗中所谓“清白”一词的社会实践罢。

(三) 熙宁风波与洛阳著书

“熙宁”(公元1068~1077年)是宋神宗的年号,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。这里要说句公道话,即使在宋神宗时期,朝廷对司马光本人也还是比较信任和重用的。熙宁元年,也就是宋神宗刚刚即位三个月的时候,便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。这一年,王安石出任

① 三朝:指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。

② 六言:即论述君德的“仁”、“明”、“武”和论述用人之道的“任官”、“信赏”、“必罚”。